

事业、学术两楷模——纪念汪长炳先生、钱亚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作者] 包中协

[单位] 江苏文化网

[摘要] 汪长炳先生（1904-1988）、钱亚新先生（1903-1990）同是早期“文华”毕业的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生前同在南京图书馆任职。1955年，汪先生从苏州图书馆调入藏书200万册，号称我国第三大图书馆的南京图书馆，为图书馆事业，恪尽职守。钱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和在图书馆界地位的确立，主要凭借他的研究成果以及晚年仍坚持学术研究的感人事迹。

[关键词] 汪长炳，钱亚新，南京图书馆

十年浩劫，斯文扫地。1967年南京图书馆（下称南图）造反派制作了两块牌子，上书“反动学术权威”，汪、钱二老无端各挂一块。阴霾扫除，乾坤朗朗，转眼到了1986年，江苏省文化局（现文化厅）为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建高知楼，汪、钱二老有幸各分一套（汪老因故未住），从此告别陋室，党的阳光温暖着两位老人的心。

汪、钱者，汪长炳先生（1904-1988）、钱亚新先生（1903-1990）是也。他们同是早期“文华”毕业的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生前同在南图任职。不同的是，一位堪称事业型学者的典范，一位无愧为研究型学者的泰斗。记得1983年10月，南图举办二老从事图书馆工作60周年茶话会，会上时任北图副馆长的丁志刚先生形象地称赞南图是“珠联璧合，美玉双收！”

为事业，恪尽职守贡献多

汪长炳先生青年时代即已跻身名流社会。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邀请汪先生等数位名家审定“四十大类”分类表一事便是明证。抗战期间，中央图书馆将制定的适合全国的图书分类表草案请专家审定。其中总类请汪长炳、毛坤，历史类请朱希祖，目录类请沈祖荣、刘国钧……。

汪长炳的青年时代，从学业到仕途，一帆风顺，坦坦荡荡。

汪先生1926年在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毕业后，由于学业优良，即任北京图书馆参考部主任，接着公派去了美国，幸运之神又一次降临到他的身上。据邱克勤先生回忆，汪先生因工作卓著于1932年秋被选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中文部工作、学习，后获硕士学位然后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工作，其间还代表中华图协出席在西班牙召开的国际图联1935年年会。

上世纪初出国深造的学者，后来大多成为图书馆界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李小缘、刘国钧、杜定友、蒋复璁、黄钰生、王重民、徐家麟、严文郁等。汪先生回国后所取得的业绩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烽火连天的年代里，汪先生毅然受命在四川璧山社会教育学院筹建我国第一个图书博物馆系。璧山是一个条件十分艰苦的小县城，汪先生却请来了杨家骆、徐家麟、顾颉刚等7位教授襄助。又千方百计从国内外搜集教学参考用书。为培养合格的学生，从课堂授课到课后实习，都严格要求。据许培基先生回忆：“在高等学校中设置学制四年的本科专业，培养具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及实践能力的较高层次人才，长炳师是有开创之功的。”十年办学不寻常，200多位毕业生如同200多颗种子撒落在全国各地。当东方红

的歌声响彻神州大地时，他们便成了建设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新生力量。远的不说，江苏省内即有贾铮（原在南图，后调北图任阅览部主任）、邱克勤（原南图副馆长）、许培基（原苏州图书馆馆长）、吴观国（原南医图书馆馆长）、何人俊（原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等。正是：茹苦含辛育英才，桃李缤纷满庭芳。汪先生为我国早期图书馆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储备了专业人才，他是我国杰出的图书馆学教育家。

汪先生与江苏有缘，冥冥中似乎早有安排。抗战后社教学院从四川迁到苏州继续办学。因战局影响，汪先生的同僚、同事有离任的、外迁的、去台的，他却“随遇而安”，迎接解放。1952年因院系调整，社教学院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奉命解散，教职员工各奔东西。原籍湖北汉川的汪先生独爱锦绣江南，不忍离去。从此，江苏图书馆界凭添一员“大将”。

建国初期，汪先生作为一位在文化界极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受到礼遇，成为党的统战对象，他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改造，逐步成为一名图书馆战线上优秀的管理干部。

1955年，汪先生从苏州图书馆调入藏书200万册，号称我国第三大图书馆的南图，他的领导才能、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南图从此进入了“汪长炳时代”。

在担任馆长的十八年中（不算名誉馆长5年和“文革”10年），汪先生审时度势，运筹谋划，将自己的治馆思想和理念与党的中心工作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保持了南图的稳定发展。

那么，南图的“汪长炳时代”究竟有哪些鲜明的特色呢？试用这几句话来概括：

基础工作扎实，规章制度严明；工作紧张有序，文化生活丰富；搬书排成长龙，加班不计报酬；注重学术交流，提倡师傅带徒；大力访购珍籍，挽救文化遗产；发挥馆藏优势，加强科研服务；编制联合目录，实行馆际互借；开展劳动竞赛，誉满文化系统。

在汪老的领导下，南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是省文化局的“红旗单位”，在同系统是口皆碑的。外界评述，汪先生是省馆中最好的馆长，也并非过誉。职工们薪金菲薄，但大家敬业爱馆，无怨无悔。如今这种精神风貌有的正在被发扬光大，有些已难觅踪影了。

回顾汪老的一生，有人会惋惜的说：“文章不多。”笔者认为不能以文章多寡论英雄。

早年，汪先生只身远涉重洋，留学深造。回国后，从文华教务主任、社教学院图博系主任，到解放后担任苏州图书馆副馆长，南图馆长，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单位“一把手”的位置上，肩负着重任，他必须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一头扎进书堆搞研究。晚年复出后，又兼任省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全国学会副理事长（第一届）。退居二线之后还担任名誉职务，直到去世。60年代初，作为党外“高知”代表，他还曾当选为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繁杂的政务工作和社会活动，牵制了他毕生的精力，著述不多也在情理之中。

人们对那些在某一领域做出贡献的人分为事业型、学术型两类，颇有些道理。一个埋首书斋的人叫他做一方领导，可能会力不从心。因为“领导”也是一门艺术，难以两全。汪先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大，学识渊博，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谙熟现代图书馆行政管理，并有着较强的社交活动能力，这正是图书馆这一新兴事业（图书馆原是“西学东渐”的产物）领导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汪老文章不多，但不可忽视。研读后发现，他的文章务实而不空谈。特点是观念新颖，意识超前，源于实践，解决问题。反映出一位基层领导为政所思，为事业所虑的高尚情操。

1956年初，周总理在知识分子大会上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6月，汪老即雄心勃勃地制定出南图《12年远景规划纲要》，上报文化部。同时在省政协会议上作《图书馆如何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专题发言；

1957年5月，在全国省、市图书馆进修班上主讲《三大系统图书馆的协作工作》，汪先生的倡议受到图书馆界的高度重视，同年9月，国务院便公布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

1963年3月，汪老在《图书馆》上发表《谈谈省图书馆为农业服务的工作》一文，在此文精神指导下，馆内编制农业科技书目，邮寄农业书刊，举办农业书展，成为南图60年代读者服务的一大特色；

“文革”后期，汪老“解放”后，下到采编部做西文分类编目、打字工作，虽被“贬谪”，但不受管制了。干起老本行来，仍然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小伙子们都啧啧称奇。此时，他撰写并发表了《图书馆图书目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

1979年，当他坐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时，已是76岁的老人了。等待他的是繁忙的馆务和学会的筹建工作。学会事、馆内事、事事操心，唯独不能顾及文章的事了。时值拨乱反正，开创图书馆工作新局面的关键时刻，汪老殚精竭虑，不敢有丝毫懈怠，就是累倒在病榻上还念念不忘工作上的事。昔日高大挺拔、风度翩翩的汪先生，如今是身佝偻、容颜衰、两鬓残，使一些远道而来看恩师的学生们大为吃惊，见此情景，无不潸然而泪下……。

为学术，衣带渐宽终不悔

宜兴，江南明珠，教授摇篮，钱亚新先生的故乡。据说宜兴出了近千名教授，如徐悲鸿、周培源、潘汉年，当然也包括钱亚新。钱先生一生走南闯北，为生活奔波，却乡音未改，洋溢着这位宜兴才子的恋乡情结。

1925年钱先生在上海国民大学巧遇启蒙老师，也是终身导师的杜定友先生，在杜先生的鼓励下，于1926年考入文华图书专科。从此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钱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和在图书馆界地位的确立，主要凭借他的研究成果以及晚年仍坚持学术研究的感人事迹。据《钱亚新集》（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披露，钱先生一生出版了专著17种，发表论文166篇。这些论著，涉及领域极广，限于篇幅扼要阐述三点：

（一）在文华读书时，他研究过中外学术著作的书末索引。有感于国内尚无专著，编写出版了《索引和索引法》一书，被杜定友赞为“我国关于索引和索引法的第一部著作”，以后，对索引学的研究从未间断，自己还动手编制了《太平御览索引》等7种。在编制索引的过程中，又引发了他对汉字排检法的研究，出版了《拼音著者号码编制法》一书，并发表论文多篇。1958年，在钱先生主持下，编制出版了很有影响的《图书馆学位论文索引》（二）。

（二）解放初期，我国没有统一的分类法，各馆各行其事。钱先生到馆后，利用旧中央图书馆的“四十大类”法进行改编，使之适应新时期图书的分编，这部分类法一直用到1958年。1956年文化部邀请钱先生参加我国第一部分类法的编制，参加者都是从事图书分类的高手。以上这些实践活动当然得益于他对分类法的理论研究，在他发表的文章中，分类学占有相当的篇幅。

（三）目录学博大精深。钱先生心有灵犀，从南宋的郑樵开始，继而推广到浙江“三祁”、尤袤、黄丕烈、章学诚、缪荃孙、姚名达，对古代近代的藏学家、目录学家的思想、学术、品德、贡献进行研究。目录学、校仇学的研究是他一生中耗用精力较多的一个领域，如果不是在一生的黄金时段剥夺了他创作的权利，他可能会在目录学研究方面有巨著问世。分类学也是这样，由于年事已高，壮志难酬。

有著作就会有影响力，就会引起学术界关注。原南图副馆长孟君孝在1983年祝贺汪、钱二老的茶话会上说：他曾接待过日本国会图书馆的三位朋友，“他们向我打听钱亚新先生，我告诉他们，钱先生尚健在，他们立即惊喜起来，像荒漠里发现清泉，激动不已。是什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呢？是钱先生的著作、文章。”

20余年来，国内发表了不少回忆、评述钱先生的文章，如倪波先生的《论钱亚新》、白国应先生的《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钱亚新》等。

1991年，原南图副馆长卢子博发表《钱亚新学术思想述评》，对他已故前辈的作品梳理分析。文中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钱亚新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厚的著述，为我国图书馆界所推崇，成为我国图书馆界的一代宗师，我国图书馆界知识分子的优

秀代表。”对钱老奖掖后进尤为赞赏：“他的家实际就是一所业余的图书馆学培训学校。许多中、青年同志登门请教，聆听钱老教诲，钱老都至诚相待，对青年一代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许多青年学子将钱老看作恩师，治学的引路人，看作自己一生所崇敬和学习的楷模。”卢馆长所言不虚。我也曾为文章的事多次上门请教，钱老总是循循善诱，使我获益匪浅。有一次时近中午，还诚邀我共进午餐。当我在四川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后，他特地叫钱师母带来一张条子，说了不少鼓励的话。凡长者都能像钱老一样恭谨宽厚，不摆架子、礼贤下士，那真是后生之福。然而横眉冷对者也不乏其人。

回顾钱老一生，时而坎坷，时而顺畅。文华毕业后，先后辗转天津、广州、上海、湖南等地的十个单位，虽然在图书馆教育、科研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受尽了颠沛之苦。

1950年起，钱老一直在南图工作，生活倒也安定。然而政治上的厄运却挥之不去。1957年用“江南春”笔名写的那篇为改进图书馆工作而向党进言的文章，正好撞在枪口上。于1958年6月定性为“犯有严重右倾错误”，他与夫人同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长子被打成“极右”（后平反），多舛的命运考验着钱氏家人。

“文革”开始了，已是“臭知识分子”的钱老又因一本还未完稿的《毛氏年谱》险招灭顶之灾。但钱老始终相信党会给他平反，会给他出路，因此他选择了坚强的活下来！正是有了这种信念，钱老才能熬过寒冬，迎来梅开二度。

自从庆祝“四人帮”垮台的锣鼓一响，钱老敏锐的感觉到科学的春天快要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钱老彻底翻了身。省图书馆学会请他出山，主编《江苏图书馆工作》；南京大学、安徽大学图书馆专业聘他为兼职教授，为研究生讲授目录学。此时的家中，谈笑有鸿儒，阅卷闻书香，好不惬意也。

晚年钱老迎来了一生中最舒心，但也是最繁忙的日子。作为学报主编，他逐篇认真审稿，一丝不苟，严把质量关。作为作者，难以抑制的写作冲动，使他文思潮涌，笔下生辉。最高时，一年发稿25篇。

古诗云：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正是钱老晚年抱病著文的写照。由于耽误的时间太多，此时的一分一秒对他来说都是宝贵的。八旬老人不顾年迈体衰，对图书馆学研究的投入和执著，使我由衷的敬佩。10年中发表的112篇论文完成了他人生征途的最后冲刺，在新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和对党无限忠诚的赤子之心。钱老在学术上达到的成就，在老“文华”人中是不多见的。

哀荣身后事，传颂有华章。钱先生的学术贡献留在人间，钱先生的忘我精神留在我们心底。